

直南第一支抗日武装——四支队

谷顺之 徐书荣 整理

抗日战争爆发，中共直南地区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负责人刘大风等，遵照中共北方局指示，在直南地区，动员一切力量，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创建了直南第一支抗日武装——四支队。这支抗日武装的建立，壮大了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特别是在抗击日本侵略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一）

直南（泛指河北省南部，以大名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人民素有爱国御侮，主持正义的光荣传统，尤其是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你来我往，贪官污吏趁机搜刮，苛捐杂税酷似虎狼，土豪劣绅为虎作伥，人民群众忍无可忍，早已孕育着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

早在1926年，直隶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生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七师第一个党支部，而后在知识分子和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于1927年10月成立了中共濮阳县县委。其后通过领导农民运动和盐民斗争，壮大了党组织，将革命火种撒遍直南城

乡。这就为直南地区的民族解放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事变不久，北平、天津相继失陷，直南人民面临着沉重的灾难。这时，共产党员王振华（七师校长）、晁哲甫（七师教务主任）响应党的号召，首先发起直南文化教育界，成立了“冀南文化界抗日守土后援会”（简称“后援会”），並立即组织宣传队，分赴农村，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守土的救国宣传活动。很短时间，直南地区的抗日热潮就如火如荼地沸腾起来。不料，国民党大名专员马运昌，竟下令禁止“后援会”的正义活动。于是王振华、晁哲甫等决定，将“后援会”改为党的外围组织——“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晁哲甫又于8月8日由大名专程抵南乐，在东街王梅书店召开文化教育界进步分子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南乐县抗日救国十人团”，与此同时，清丰、濮阳等县也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十人团”。

8月下旬，日军沿平汉路南犯，涿县、保定、石家庄先后陷落，南犯之敌，连下邢台、邯郸、渡过了漳河，大名、南乐、清丰、濮阳沦陷，已属在劫难逃。广大群众走投无路，人心惶惶。一些爱国青年认识到只有对日作战，把侵略军赶出中国去，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所以，他们迫切要求参加抗日武装；也有一些青年想到国民党后方找出路；

还有些富裕之家竟携资南逃。针对这种局面，“抗日救国十人团”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复讲解只有开展游击战争，抵抗日本侵略者，才是唯一出路。于是，很多动摇不定的青年，纷纷留下来，盼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抗日战争。

(二)

1937年10月上旬，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退驻邯郸，中共中央派往该部的党代表朱瑞（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冀南、豫北一带党的领导工作），指示冀南特委（领导冀南近30个县的党组织）书记张玺，要迅速派人去恢复大名以南各县的党组织，成立直南特委；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抓紧时间，集中力量，建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于是，张玺便委派刘大风为中共直南特委临时书记，去直南地区开展党的工作。

刘大风是南乐县佛善村人，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加之当时平型关大捷的影响，他一来直南，群众纷纷议论：“共产党回来了，有办法了！”他到南乐就给齐连、王雨亭等说：

“党交给我的任务是要迅速恢复大名以南各县的党组织，成立直南特委，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並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很长的斗争历史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恢复和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以‘抗日救国十人团’为骨干，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完全可能的。”刘大风首先和在直南、豫北坚持工作的老党员王振

华、晁哲甫、平杰三、王从吾、刘汉生、等取得联系，研究筹建抗日武装等问题。这时，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建立，所以，直南各县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就顺利恢复起来。

10月中旬，刘大风在南乐、清丰一带，以“抗日救国十人团”为骨干来筹建游击队，就游击队的名字向朱瑞请示。朱瑞派朱则民去29军联系。朱通过张克威（共产党员，29军石友三部学兵队队长，后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的生产部长，解放后任东北农学院院长）和袁也烈（学兵队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司令员，后是海军部的参谋长）找到石友三（181师师长），适逢大名失陷，石友三退驻南乐城西一带。这时，由刘大风、刘汉生主持在近德固村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列席参加的有冯仰舟、李渭川、张德光、刘锋、潘宾、王雨亭、赵秉谦、齐连、吴振卿、李桥等。会议研究了关于建立抗日武装的问题，并决定：1、串联动员青壮年参加游击队；2、落实枪支、弹药数字；3、经费来源困难，大家来想办法，先把部队组织起来，再力争各方面支援，不能坐失良机。会后，赵秉谦去元村给181师张克威送信，并说明建立抗日武装的进展情况。经过一系列工作，石友三只同意给181师游击队的名字，不发枪支弹药、给养。由于人民群众抗日呼声很高，有群众基础，于是，特委决定先做好参军人员的家属工作，于10月下旬在留固店集合。

留固店是南乐县城西南的一个大村。一天下午，张克威带着181师学兵队全副武装的张静岑、李景岩、董文华、张伟等来到留固店。张伟首先把“181师游击队报到处”的大字通告贴在东寨门上，指挥部设在邵汉三家。当天，自带枪支前来报到的有冯仰舟、张德光、吴子厚、吴振卿、吴近人、刘锋、刘金鸣、潘林、潘宾、杨向署、李鸣恪、李桥、杨清山、李渭川、王雨亭、王建阁、王石山、石一彬、彭儒、赵秉谦、赵彦人、赵西安、赵振寰、谷平方、齐连、齐耀臣等40余名青年。几天后，留固店的邵德普，邵学琴、邵学善、邵秉先、邵法先、胡令生也来参加。十几天内，就发展到60余人、50来支枪。正式建立了中共直南特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181师游击队。张克威兼任队长，刘大风任副队长兼政委，袁也烈任参谋长。游击队成立之后，吃穿全由队员自理，还发动有条件的队员多带一些以帮助其他同志，社会上有些富裕之家，也自愿支持些粮款和衣物。不分干部和战士，吃的都是高粮、玉米面。晚上干部、战士同睡在一个草铺上。每到一处做饭、用柴都要照价付钱。人民群众看到游击队纪律严明，很受感动，有的主动送东西，有的及时送情报，游击队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鱼水关系。半个月后，游击队从留固店转移到清丰县西北的古城镇，清丰的王冠儒（1929年任中共清丰县委书记，当过教师）、金立耕、阎之青、傅学楷、聂凤巢、张清聚、杨耀汉、靳生云、刘国选……还有六个女同志：高栖鸾、高素

环、彭月梅、尚素娥、李梅云、张剑锋也来入伍。郭献瑞从南乐县东带来了30余名“抗日救国十人团”团员和进步青年也加入游击队。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200余人，100多支枪，建制三个中队，一个通讯排。第一中队无业农民较多，队长路文慈，指导员杨真；第二中队多是有觉悟的青年，队长马参三，副队长刘子良，指导员季铁中；第三中队队长张德光，指导员阎之青。通讯排排长潘林，指导员赵彦人（后为赵秉谦），这个排是由筹建时的宣传队改编的，它不仅负责司令部的警卫、通讯联络，还负责政治宣传工作。

不久，181师奉命南撤，张克威、袁也烈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也随之而去。这时，河北民军司令高树勋所部进驻清丰县。刘大风和高的副参谋长唐哲民（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经唐与高商定，将“181师游击队”改为“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支队长唐哲民，副支队长兼政委刘大风，参谋长张西三，政治部主任冯仰舟，组织科长陈睿，宣传科长张伟，王冠儒负责供给，李素若负责联络，宣传队长刘国选。高树勋又发给30支枪，3,000发子弹和万元法币。并在固城镇召开了庆祝大会，会上高树勋讲话后，朱则民作了形势报告，古城会议后，高树勋给四支队战士换了军装，并允许到高兵站领取给养和一些军需物品。从此，四支队的军容和生活也就有所改善。

12月15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乐，炮击清丰县城，高树勋率部南逃，唐哲民也随高部南下。四支队仍由刘大风负责

领导。当天，日军首次攻占清丰，进行两三天之残酷烧杀之后，弃城而去。这段时间，直南各县乃至豫北各地，兵匪蜂起，如杨法贤、段四合顺、槐花子（黄建业）等土匪武装，都乘机插杆树旗，招兵买马，互相吞并，争拉山头，架“肉票”，要枪支，闹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在这种形势下，四支队第一中队队长路文慈，组织性差，吃不了苦，就带30余人，30来支枪，去投靠土司令路先州。这是四支队前进路上的第一次曲折。为了加强对四支队的领导，中共北方局又适时地派肖汉卿任队长，刘大风仍任副队长，陈耀元任第二中队队长，漆汉臣任第三中队队长，三位均为红军干部，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向战士进行红军革命传统教育，发扬“三八作风”，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很快使这支部队树立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四支队官兵在整个冬天，没有被褥和床铺，都是穿着衣服睡在玉米杆地铺上，硌得腰疼，但他们从不叫苦，宣传队为此编了快板来鼓励士气：“玉米杆硌得慌，学习卧薪把胆尝，棉衣棉裤不需脱，虱子多了不痒痒。”地铺上有时铺上谷草舒服一点，就又唱道：“干草黄，暖洋洋，胜似棉被和热炕，不怕北风和大雪，舒舒服服入梦乡。”所以，当地群众一听说国民党的军队来了，都望而生畏，不敢近前；一说是“刘大风的部队来了”，则夹道欢迎，远接远送。四支队在直南人民的心目中已有了相当高的威望。

(三)

与直南特委筹建抗日武装的同时，平杰三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井店（原属濮阳，现归内黄）家乡，公开以“抗日救国十人团”的名义恢复共产党的组织。平杰三和刘玉峰、张怀三于1937年10月恢复了中共濮（阳）滑（县）内（黄）边县委，县委在抗日救国前提下，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通了濮阳专员丁树本（原是冯玉祥部军官）的工作，经协商后，以丁的名义成立了“河北省濮阳县民军第八大队”，队长平杰三，八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千口队是刘汉生、赵子云、刘玉峰等组织的；化村和太平村队是王从吾和张增敬（才从狱中放出）等组织的；井店中队是平杰三利用民团改造的。八大队是中共濮滑内县委的武装，在井店一带活动，共有百余人。

11月底，直南特委正式成立，朱则民任书记，刘大风任副书记（兼支队长）。这时，四支队驻在清丰县梁村，在供应上仍是王冠儒、李素若负责，通过各种关系来筹措经费和粮款。春节时，粮食不足就发动群众支援，如通讯排一班在班长齐连带领下，去大高村动员粮食时，进村后，集体唱歌，把群众吸引过来，进行抗日宣传，说明四支队是为打日本建立起来的，誓死不做亡国奴，军民团结打日本保家乡……四支队目前遇到极大的困难，给养供应不上，希望大家献点粮食以济燃眉之急！群众听后，非常感动，一小时内就收

集了五、六袋粮食，並主动用马车送到梁村。1938年农历大年初一那天，战士们唱道：“窝窝头，小米汤，萝卜咸菜脆又香，每班一碗辣椒酱，顿顿吃个大净光。”

1938年2月7、8、9三日，日本侵略军接连攻占南乐、清丰和濮阳。清丰、南乐县长皆闻风逃遁，濮阳专员兼县长丁树本，据城抵抗一阵，便撤至城东70里黄河堤边的小常庄。

2月中旬（正月十五日），特委决定将四支队开往井店活动，途经千口、太平、化村等村，在井店和八大队会合，並在各村组织召开军民联欢会，由王从吾、刘汉生、平杰三、张增敬分别在联欢会上讲话，动员青年参加抗日军队，团结起来打日本保家乡。同时，将八大队的主力与四支队合並，序编为第四中队，刘玉峰任中队长。原八大队留25人，25支枪，继借丁树本的名义，由平杰三带领。两支队伍合並后，共400余人，270多支枪，设四个中队（缺一中队）一个通讯排，增设了政治部，刘汉生、张增敬任政治部主任。同月21日，四支队曾发出《为联合抗日敬告各武装部队书》，原文为“本队郑重向冀南所有正规部队、保安队、民团、民军、别动队、游击队、民众抗日自卫队以及一切武装团体建议：立刻在抗日反汉奸的目标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动地、民主地团结起来！各自派遣代表商定日期与地址，召开抗日的军事会议，选出统一的指挥部，集中力量，共同行动，坚决为保卫华北而抗战到底！本队随时

欢迎各方代表进行商洽。最近（四支队）到鲁西，该区领导游击队的前线委员会，与豫北游击队、后方预备队等武装团体，商讨共同成立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队军政委员会。”这个《敬告书》是符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

（四）

1938年2月下旬，四支队由井店开往清丰西南的王什村。在这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当讨论到如何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同志认为：丁树本是五县专员、保安司令，是当地最高长官，日军来了他敢于抵抗一阵，现在还未过黄河南逃，说明他是抗日的，四支队在丁的管辖区活动，他应该是主要统战对象，就应接受和服从他的领导，将四支队改用丁树本的番号，与他一起活动。有不少同志认为：和丁搞统一战线是对的。但四支队是河北民军，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因此，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联合丁树本共同抗日，才能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创抗日根据地。如和丁树本搞到一起，就会限制四支队的发展，这条路不能走。讨论结果：根据北方局指示，特委决定和丁树本联合抗日。于是朱则民以直南特委和八路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应丁的邀请带领阎之青、杨钧等由王什村径往丁的司令部驻

地常庄。朱则民等向丁树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明了四支队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和丁交谈结果，丁同意留下来和四支队合作抗日，给四支队以给养帮助；在共同对日作战时，四支队可受丁的指挥，但四支队的组织和建制保持独立。

与此同时，四支队由肖汉卿、刘大风、刘汉生、张增敬等率领，从王什北去转至清丰县东部的六塔镇。一路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遇有土匪骚扰，群众一说“老红军来了”，土匪皆消声匿迹。3月8日，由六塔抵达濮阳县城东60里小濮州集结待命。次日清晨，肖汉卿、刘大风去常庄会见了丁树本。常庄是个有名的地主庄园，周围有寨墙，寨外有几米深的水壕，壕外是用荆棘编的木寨，四门设吊桥，东、南两面不远就是黄河大堤，西北方向八里路就是小濮州。丁和肖、刘会见后，丁正想借用四支队的力量，所以，乐意去小濮州与四支队见面，以表欢迎。

3月9日这天，正值小濮州庙会，人特别多。四支队整整齐齐地集合到村西大庙前的场里，听丁讲话。赶会的群众也把会场围得严严的。当丁树本正兴致勃勃地讲话时，突然，四支队的哨兵跑到主席台前，立正敬礼道：“报告！发现正西方位有骑兵！”丁见赶会的群众已经乱了，便镇静地说：“不要怕！那是我们的骑兵侦察队！”仍继续讲话。一会儿，哨兵又跑来报告说：“不好了，穿的黄军装，骑的是洋马，日军来了！”丁树本一听便心神无主，肖、刘马上派

人骑马护送丁回常庄去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肖队长当即立断，命令二中队正面出击，三中队从右翼，通讯排从左翼包抄敌人，四中队做后备，因那天赶会的人很多，敌人离四支队很近了，还未发现隐蔽的战士。当敌人进入射程以内时，肖队长一声令下，二中队轻机枪手马纪德一梭子子弹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有七个鬼子跳下马来就地抵抗。战士吴振卿和老毛司（外号），每人刺死一个鬼子，各夺得一支38式马盖板枪，有位战士和敌人搏斗时不幸牺牲。广大指战员满怀着为中华民族报仇雪恨的怒火，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很快结束了战斗。这次伏击战，共打死日军四人，缴获马盖枪四支，战马一匹及一些军用品。四支队战士牺牲一名，靳生云等三位战士负伤。次日，四支队便主动转移到常庄周围的一带村庄。

3月11日拂晓，日军又报复性地直驰小濮州转攻常庄。当时，日军只有一个步兵中队和骑兵小队（没有伪军）。四支队加上丁树本的几个连和保安团，人数比敌人多，武器不如敌人。对整个阵地的部署是：司令部和丁的几个连固守常庄，其保安团固守在常庄东北三里的姚庄土围子里，四支队通讯排由肖汉卿、刘大风带领固守常庄西一里的王楼村，二中队由陈耀先、季铁中带领固守常庄东门外的 小 屯 村，三中队由漆汉臣、杨真带领固守常庄北二里的于庄。上午10点许，日军从小濮州搜索前进，行至姚庄，遭保安团据寨迎击，急转攻常庄。在小屯阵地，二中队指导员季铁中

和二排长张清聚带领战士英勇阻击，接连打退敌人几次进攻。敌人转攻常庄北门，又被四支队三面包围，丁的部队和常庄群众又从北门往外射击，（群众用四门大型土炮，每次装10余斤火药），黑烟滚滚，杀声不绝。周围村庄的群众还拿些花生、鸡蛋、油饼，提着水去阵地慰劳，有的群众拿着长矛大刀，前来助阵。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敌人孤军深入，又不了解我方情况，拖下去怕吃大亏，就乘夜撤退了。据群众说，敌人撤退时，拉走几马车用麻袋装的尸体，半路上又有抗日群众和槐花子的土匪武装擂鼓呐喊、鸣枪追击，日军也不敢还击，狼狈地退回了县城。

事后，丁树本仅补发给四支队500发不合口径的马力匣子弹，其余战利品都归他了，而四支队则牺牲了刘明芹（南乐县佛善村人，22岁）、李志远（南乐县近德国人，20岁）、申玉学（近德国人，19岁）等四位战士。常庄保卫战后，四支队和丁树本部一起在小濮州召开庆功大会。丁还借四支队缴获的马盖枪、军衣、皮鞋、大洋马进行拍照，并派人去武汉向蒋介石报功请偿。丁在大会上说：“以后你们不要叫四支队了，只说是丁司令的队伍就行了。”还提出要陈耀先任丁的团长。通过共同作战的体会和丁树本的讲话，在特委和四支队内部又产生了新的分歧：一是认为丁树本没有抗战诚意，只是想借四支队的力量发展自己，进而吃掉我们，四支队应单独作战，开辟根据地；另一种意见认为单独作战就是离间四支队同丁树本的关系，是破坏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此后，丁树本所部向西南方向转移，四支队就开往濮城东。

3月下旬，四支队在濮城东王辛店等村整顿时，刘晏春等在濮阳、濮县之间组建的5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前来并入四支队序编为第五中队，中队长马功臣，指导员刘国选。这时，四支队已发展到400余人。400多支枪。一天晚上，特委书记朱则民拿了一封署名汪静涵从西安寄给李素若、王冠儒、李茂林的信，让刘大风看，信的大体内容是：听说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希望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总之，是些问候和鼓励的话。不料特委内部对此信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汪静涵是张慕陶的化名，张慕陶是托派，他三人就是托派应处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汪静涵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汪静涵不是张慕陶的化名，确有其人，家是南宫县的。刘大风再三审辩说，他认识汪静涵，并建议先把他们三人捕起来，进行审讯，弄清了再作处理，这样比较稳妥，而朱则民则说刘大风包庇托派，不听建议，在组织科个别人的纵愿下，就秘密地将王冠儒处决了。在处决王冠儒的前两天，刘大风主动要求去延安学习。临走前朱向刘大风宣布：“因包庇托派，破坏统战，给停止党籍三个月的处分。”王的被杀，刘大风怀着极大的委屈为党工作，便改名“安明”，意思是“安心工作，久而自明”。李素若外出为四支队搞经费，王冠儒死后没几天，他因送捐款回到王辛店，午饭时还争论问题，下午即被四支队逮捕，借

丁树本之名，将李杀害。李茂林闻信后，躲到晁哲甫那里，幸免一死，后在抗战中壮烈牺牲。

王冠儒是1927年的党员，教学多年，任过中共清丰县委书记，四支队里有他很多学生，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做四支队的供给工作是有成绩的。李素若是1925年的党员，任过中共大名特支和中共濮阳特支书记。曾利用上层关系给四支队搞过募捐，写文章宣传四支队的成绩，四支队唯一的收音机就是他捐献的，曾把家中祖传的元宝兑成钱献给四支队作经费。水灾时还救济过群众。在当地一至直南地区是有威望的人物。所以王、李之死，在四支队内部和直南地区影响很大，好多人议论纷纷，怨声四起，无法理解。参谋长张西三痛哭失声，愤怒地说：“这是为什么？”傅学楷痛哭流涕，在王冠儒死处默哀，不忍离去。至使全体战士情绪不安。经晁哲甫等以抗日大局为重，作了很多工作，才将战士情绪稳定下来。对这起冤案，晁老临终前还念及此事。这是四支队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大曲折。给四支队的发展壮大和后勤供应带来了人为的困难。

1938年4月上旬，即杀害李素若的第二天拂晓，四支队200余人便由副支队长肖汉卿指挥，迅速转移到清丰县吴仙镇。在清丰县委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和支持下，收复了清丰县城。逮捕24名汉奸，处决8名；参谋长张西三和秘书主任李渭川带领一个中队收复了南乐县城。伪县长何举之落荒逃跑，其弟何贤轩和一名作恶多端的汉奸被活捉后处

决。在肖汉卿指挥下，四支队又解放了离大名城20里的水上交通重镇龙王庙。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又筹款万元。经过这三次胜利，四支队的军威重震，又迈开了新的步伐。

但是，直南特委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即请丁树本委派人当县长，将四支队的胜利果实让给了丁树本。同时，特委主要负责人，只怕刺激了丁树本，把许多有爱国思想，一心向往共产党，从四面八方跑来要求参军的青年，拒之门外，严重影响了四支队的壮大。

(五)

1938年6月，朱则民调冀鲁豫区委工作，王从吾接任直南特委书记，唐哲民重返四支队任支队长。当时的直南、豫北地区，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土匪蜂起，加之洪水为患，致使人民遭难。井店周围有一股土匪，领头人是刘相友，约有400人，300支枪。刘有三个“绿林”弟兄，都有一支人马。他们经常结伙打家劫舍，与地主武装对抗。如能把刘的武装引导到抗日方面来，即可增加抗日力量，又给人民解除痛苦，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再者，滑县一带有支以四支队三大队的名义组成的游击队（队长张静岑，指导员吴兰田，1937年11月筹建），在活动上也可以互相联系以利工作。于是，特委决定将四支队开往井店一带。

四支队到井店后，正值刘相友伙同另一股土匪打开了滑县城，激怒了滑县的红枪会等地主武装，联合对刘进行追

击，列开阵势准备决战。在双方相持不下时，特委决定分别去做工作。王从吾、刘汉生、平杰三、张增敬、刘玉峰等是当地人，又领导过农民运动，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由他们利用党的间接关系，去作有关地方士绅的工作，说明利害，让其收兵。同时，派唐哲民以四支队司令员身份找刘相友面谈。刘相友本是贫苦的农民，勤劳操作，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抗战前的一天，他在地里锄地，偶遇地主武装追捕土匪，从他身边经过向东逃跑，问他却说：“向西”跑了，结果使土匪逃脱。地主武装返回说他和土匪相通，抓去打得死去活来，要罚几百块现洋，否则送县坐牢，刘将家产卖净也难付罚款，其母哭得死去活来。土匪头子杨发秋闻讯，感其救命之恩，用钱将刘赎回。于是，刘相友就索性上了“梁山”，随杨发秋发迹起家。但他主持正义有爱国心，不贪财，不欺压百姓，是个“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唐哲民与刘谈话时，晓以抗日救国之民族大义，亮明政策，指出前途，推心置腹，赤诚相见。唐哲民同刘相友结拜为兄弟，尊称他为“刘大哥”。请其带队归入四支队时，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让滑县的追兵撤回，并保证永不报复；二是他本人可以加入四支队，其余“绿林”弟兄加入与否，应听其自便，不得以武力相强。刘相友说的第二条，唐哲民当面允诺，至于刘提的第一条，唐与特委交换意见后，又去做濮滑内边境豪绅代表们的工作，这些人一起说：“唐司令说咋办就咋办！我们服从，只要刘相友能跟随四支队，舍身抗日不当土